

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 的经济成效评析*

邹志强 俞海杰

内容提要 土耳其“百年愿景”蕴含着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打造“新土耳其”的全面设想，其经济内涵尤为丰富和关键，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理念的历史延续，也是埃尔多安时代国家经济治理成就的象征，并影响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围绕“百年愿景”的经济规划，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调整措施，以投资与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在内外不利局面下努力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在建国百年到来之际，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出口额、通胀率和失业率等主要指标看，“百年愿景”所设定的多数宏观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土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国内政治纷争和国际环境冲击等内外不利因素，共同阻碍了“百年愿景”经济目标的实现。在2023年大选与建国百年背景下，土耳其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上升，经济困境的延宕制约了其内外转型进程，也势必影响土耳其的国家发展路径及其前景。

关键词 中东经济 土耳其 “百年愿景” 埃尔多安 建国百年

作者简介 邹志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俞海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土耳其“2023 愿景”（2023 Vizyon），即土耳其版的“百年愿景”，是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2011年提出的涵盖众多领域的国家发展规划，希望以更加辉煌的发展成就迎接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百年。之后，土耳其各政府部

*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中美在中东地区的‘新基建’竞争及对策研究”（2022BGJ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西亚非洲》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

门在政治、经济、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外交政策、旅游、科技、社会等领域纷纷推出了以2023年建国百年为时间节点的一系列发展规划。这些陆续推出的各领域发展规划与最初的“2023愿景”一起，共同构成了土耳其的“百年愿景”，凸显了土耳其期望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成为一支重要全球性力量的雄心壮志。^① 此前第一个十年执政取得的优异经济发展成就是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提出“百年愿景”的主要背景和基础。其中，广受外界关注的经济目标与规划是“百年愿景”的核心内容，经济内涵也成为理解土耳其“百年愿景”的关键维度之一。然而，自该愿景提出以来，土耳其进入了一个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新转型期，经济增长起伏不定，脆弱性更加突出，“百年愿景”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2023年，土耳其先后经历大地震和争夺激烈的大选，并将迎来建国百年纪念，而严峻的经济挑战和难以如期实现的发展目标，使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饱受国内外指责。

“百年愿景”的宏大经济目标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背后，是土耳其近年备受争议的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遭遇持续难解的现实困境。部分学者从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解读，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经济治理是“威权新自由主义”“民粹新自由主义”的表现。^② 随着土耳其经济问题日益凸显，舆论多将其指向埃尔多安经济政策的失误，^③ 并用“非正统”“埃尔多安经济学”来形容土耳其近年非常规的经济政策。还有学者将土

^① 魏敏、李炜懿：《土耳其〈2023年愿景〉：路径、成效和中土合作前景》，载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24（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6页。

^② See Cemal Burak Tansel,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a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urkey: Beyond the Narratives of Progress”,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Vol. 23, No. 2, 2018, pp. 197 – 217; Cemal Burak Tansel, “Reproducing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in Turkey: Urban Governance and State Restructuring in the Shadow of Executive 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Vol. 16, No. 3, 2019, pp. 320 – 335; Didem Özkiziltan,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in AKP’s Turkey: An Industrial Relations Perspec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50, No. 3, 2019, pp. 218 – 239; Ümit Akçay,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Dynamics in Turke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7, No. 1, 2021, pp. 79 – 104; Görkem Altınörs & Ümit Akçay,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Crisis, and Consolid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me Change in Turkey”, *Globalizations*, Vol. 19, No. 7, 2022, pp. 1029 – 1053; E. Babacan, M. Kutun, E. Pinar, & Z. Yılmaz eds., *Regime Change in Turkey: 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Islamism and Hegemony*, London: Routledge, 2021.

^③ 张帅、管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基于土耳其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3期，第21页。

土耳其经济问题归因为政治危机特别是实行总统制带来的混乱。^① 实际上，土耳其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埃尔多安本人或正发党政府的政策失误，土耳其经济也并未如外界担忧的那样走向崩溃。对于土耳其的经济治理表现，既需要结合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加以系统分析，也需考虑土耳其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因此，在土耳其建国百年背景下重新审视“百年愿景”的经济内涵及其成效和挑战，对于把握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前景与国家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缘起及其经济内涵

土耳其共和国在 1923 年建立后，一直努力追求成为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强国。在国内政治变革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历史进程中，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深受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定位与意识形态影响，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探索与演变过程。

1923 年至 1946 年是土耳其摆脱帝国和殖民经济遗产并在动荡的内外环境中艰难探索经济自立的时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基础是衰败不堪的奥斯曼帝国经济遗产。^② 土耳其既深知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和西方的强大，也对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深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与控制的历史深有感触。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土耳其一方面谨慎而分步骤地收回经济主权，清理帝国和殖民经济残余，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树立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目标，并逐步确立了国家主义发展原则。实际上，土耳其建国后在经济上仍带有封建和买办特征，只是在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中为了突出凯末尔的形象，帝国向共和国转变的割裂程度被某种程度上夸大了。^③ 1929 年土耳其取得关税自主权，而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土耳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学习借鉴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短暂实施了“五年计划”，尝试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向国家主义的发

^① M. Murat Kubilay, “The Turkish Economy under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13,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turkish-economy-under-presidential-system>, 2023-01-20.

^② Koçtürk, O. Murat ve Gölalan, Meryem, “1923-1950 Türkiye Ekonomisinin Yapısal Analizi”, *Üçüncü Sektör Kooperatifçilik*, Cilt. 45, Sayı. 2, 2010, ss. 48-65.

^③ [英国] 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 1299-1923》, 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579 页。

展模式前进，以谋求更大的经济独立。在土耳其看来，西化的政治与经济愿景是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同时需要借助多种方式维护自身经济独立。国家主义包含土耳其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深层期盼，是数代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共同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并对之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是土耳其探索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渐过渡到全面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1946年开启的民主化改革结束了土耳其共和国前期的绝对威权时代，经济制度随之也出现了松动，但现代化和西方化依然是土耳其历届政府的主要追求目标。土耳其逐步形成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和外国资本“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其中私人资本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一度推动了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后来经济形势恶化又使之放弃了这一政策，民主党集权和社会动荡最终引发了1960年的军事政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五年计划”方式发展经济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固定模式，进口替代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由于军方势力直接介入经济领域，成为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之一，土耳其经济格局由之前的“三足鼎立”演变为“四强逐鹿”，影响了土耳其经济发展长达40余年。^②这一时期，土耳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相互交织，军方在1971年和1980年又发动两次政变，政治动荡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规划与进程。长期坚持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虽然维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但经济发展成效并不显著，并加剧了社会秩序动荡。

20世纪80年代之后，土耳其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和发展阶段，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经济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并产生了长期影响。^③1983年开始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图尔古特·厄扎尔引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货币、物价与贸易改革，开启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

^① 李鑫均：《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65页。

^② Erdinç Tokgöz, *Türkiye'nin İktisadi Gelişme Tarihi (1914 - 2018)*, 11. Baskı, Ankara: İmaj Yayınevi, 2018, ss. 169 - 170.

^③ [美国] 弗罗兹·艾哈迈德：《现代土耳其的形成》，郑东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77页。

一时期，土耳其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更为明确地要求加入欧盟，以成为欧洲发达国家为目标进行国内改革。厄扎尔政府的经济政策成效显著，对外贸易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推动土耳其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外贸逆差扩大、贫富分化加剧、外债大幅增长、私有化进程阻力重重等问题。此外，在经济治理领域，土耳其国内财政与金融改革较为滞后，监管制度不完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体系和工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和完善。这为后来土耳其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国内危机迭起、政府更迭频繁背景下，1991年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持续了8年，^①1999年和2001年的严重金融危机既重塑了土耳其与国际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推动了土耳其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化。

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进入深度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和调整阶段。正发党的长期执政结束了过去数十年土耳其政局的周期性混乱局面。正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更为深入的改革调整措施，既重视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又支持伊斯兰传统价值。一方面，正发党政府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进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更趋明显。正发党执政后致力于发展经济，扭转了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的经济形势，形成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赞许。^②另一方面，相对保守的安纳托利亚新兴工商业阶层快速壮大，成为传统世俗的西部大企业集团之外的新经济力量。土耳其私人资本领域形成了以工商业联合会（TÜSIAD）和独立工商业联合会（MÜSIAD）为代表的两强并立格局，为土耳其经济注入了温和伊斯兰主义色彩。在正发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土耳其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融入全球经济密不可分，并受益于全球资本流动的加快。^③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④为土耳其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声誉，使之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主要代表之一而受到全球高度赞誉，这一时期可谓土耳其经

^① Ahmet Ay and Zeynep Karaçor, “2001 Sonrası Dönemde Türkiye Ekonomisinde Krizden Büyümeğe Geçiş Üzerine Bir Tartışma”, *Selçuk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 Dergisi*, Sayı 16, 2006, s. 70.

^② 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

^③ Ziya Öniş, “Power, Interests and Coali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Privatisation in Turke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2, No. 4, 2011, p. 707.

^④ Turan Subaş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s Economic Miracle”,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2, 2014, pp. 137–160.

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百年愿景”正是在正发党执政时期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被提出来的。在连续3次选举胜利且取得优异执政成绩的背景下，埃尔多安于2011年推出了雄心勃勃“2023愿景”，期望在建国百年之际将土耳其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该愿景在随后得到进一步充实与丰富。“百年愿景”官方文件推出后，埃尔多安反复予以强调和重申，使之内化于土耳其政府各项政策与制度之中，通过推出新的发展规划并根据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愿景内容与影响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因此，土耳其“百年愿景”是一个不断调整完善、内涵丰富的国家治理纲领，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国家治理承接前期执政成就并开启新阶段宏大愿景的重要象征。就经济内涵来看，“百年愿景”的主要目标包括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5万美元，年出口额达到5000亿美元，永久性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降至5%，就业率增加50%以上。^①此外，愿景还包含进行大规模建设公路、铁路、航空交通及能源基础设施，打造全球制造业和物流中心，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旅游业等丰富内容。

“百年愿景”的经济内涵延续了土耳其的百年强国梦，更蕴含着正发党打造一个“新土耳其”（Yeni Türkiye）^②的宏大构想，并体现出土耳其的经济治理理念与路径特色。其一，“百年愿景”的经济目标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内涵的历史延续。回望过去，近百年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起伏，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国家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复杂演变，经济发展愿景也发生了从成为西方式的先进国家到全球领先大国的微妙转变。随着经济崛起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土耳其在身份定位和内外政策之中更为明确地寻求战略自主与大国地位，而经济始终是其百年强国梦的核心内涵和关键基础。“2023愿景”宣称其目标是以可持续的增长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建设一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球竞争力强大的土耳其。其二，“百年愿景”的经济内涵彰显了埃尔多安时代的经济治理特色。正发党执政前期，土耳其政府不仅敏

^① “2023 Siyasi Vizyon”，AK Parti，<https://www.akparti.org.tr/parti/2023-siyasi-vizyon>，2022-10-16；“Turkey-2023 Vision”，European Sources Online，<https://www.europeansources.info/record/turkey-2023-vision>，2022-10-16。

^② 参见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4~6页。

锐地把握和有效地回应了国内持续上升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趋势，也借助世界民主化与全球化浪潮，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取得了耀眼的经济发展成就，并重塑了国内政治格局。这为埃尔多安长期执政奠定了核心基础，也促使其继续提出更具雄心的发展战略，“百年愿景”的宏大经济目标正是其治理理念与特色的鲜明体现。可以说，“百年愿景”既是正发党与土耳其的愿景，更是埃尔多安本人的愿景。^①其三，以经济内涵为中心的“百年愿景”深刻影响到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国家长远发展前景。2014 年 8 月，埃尔多安将自己当选为土耳其首位全民直选总统的当天视为“新土耳其的生日”。此后，埃尔多安在政治集会上频繁使用“新土耳其”一词，“新土耳其”成为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符合其原则的国家重生的代名词。^②埃尔多安反复提出要塑造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土耳其”，“百年愿景”是塑造强大“新土耳其”的外在体现与实现路径。由此，“百年愿景”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不仅事关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关系到埃尔多安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及“新土耳其”的前途。

二 土耳其“百年愿景”下经济治理实践

正发党执政前期推行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土耳其经济在经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显示出强劲的恢复能力，2009 年的首次负增长之后又很快实现了反弹，2010 年和 2011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8.4% 和 11.2%。^③但正发党政府在取得耀眼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更加固化了以外向型和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外资流入的经济发展路径，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加难以改变。2011 年以来，土耳其政府围绕“百年愿景”经济目标开启了新的国家经济治理征程。这一时期，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土耳其在

① 管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2 期，第 77 页。

② Aslı Aydıntaşbaş, “The Turkish Sonderweg: Erdogan’s New Turkey and its Role in the Global Order”, *IPC – Mercator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20, <https://ipc.sabanciuniv.edu/Content/Images/Document/the-turkish-sonderweg-erdogans-new-turkey-and-its-role-in-the-global-order-d383b9/the-turkish-sonderweg-erdogans-new-turkey-and-its-role-in-the-global-order-d383b9.pdf>, 2022-10-21.

③ IMF, “Country Data: Turke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TUR>, 2022-09-12.

经济发展韧性彰显的同时，其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围绕“百年愿景”的经济发展举措不得不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经济治理模式遭遇持续挑战。相对而言，2011年之前土耳其的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理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外部规范性力量的影响，更具市场化和自由化特征；之后土耳其经济政策呈现出受到伊斯兰资本影响、国家干预增强的特征，并与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相适应出现保守化倾向，土耳其经济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危机频现。

（一）“百年愿景”语境下的土耳其经济政策

第一，针对本国经济结构特点，土耳其政府将投资与出口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正发党执政前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是日益强化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资本快速流动和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使土耳其经济高度依赖外来资本流入。土耳其提出“百年愿景”后，在国际宏观经济下行和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为了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和经常账户赤字，更为重视以投资与出口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在国内经济层面，一方面，土耳其推出了更为系统的投资吸引政策，提升国内工业区、自由区的运营效率，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打造最佳投资目的地形象。2012年，土耳其颁布了投资激励计划，对在指定落后地区投资以及大型项目投资给予更多激励与优惠。2014年，土耳其推出融资担保政策，带动了一大批交通领域大型项目的落地。2016年底，土耳其推出“投资吸引中心”项目，进一步向东部地区省份的投资提供倾斜政策。土耳其政府发布的“外国直接投资战略（2021—2023）”显示，2003年至2020年土耳其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251亿美元，其中2011~2020年的十年为1308亿美元。土耳其希望到2023年将该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1.5%，为此制定了11项战略，并据此采取72项具体行动。^①另一方面，土耳其扩大了国内投资力度，利用政府和财团资金推进房屋与基建投资，并力争引导国内投资流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愿景”的重要内容，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和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土耳其政府大力开展建筑、交通、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国内通讯网络、智能电网发展规划等，并实施“中间走廊”

^① Turkey Investment Offi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rategy of Turkey (2021 - 2023)”, <https://www.invest.gov.tr/en/library/publications/Lists/InvestPublications/Turkiye - Foreign - Direct - Investment - Strategy - 2021 - 2023.pdf>, 2023 - 03 - 10.

计划，打造国际交通与能源枢纽。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土耳其在投资、就业、生产、出口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基础上启动了增长进程，“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经济转型”。^①

在对外经济关系层面，土耳其一方面更为重视出口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努力优化出口结构。土耳其政府认为出口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经济带动效果，也有利于稳定国内资金供应和就业稳定。埃尔多安多次强调出口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将之列为经济发展的四大优先目标之一，认为出口系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② 土耳其政府发布的“2023 出口战略”提出，从生产和出口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产品结构，转向以先进技术和研发为基础的高附加值领域。^③ 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经济外交，积极推动本国出口和吸引外来投资。近年，埃尔多安频繁出访亚太、非洲、中亚、中东等地区相关国家，主动设定双边经贸发展目标，努力扩大贸易往来规模，拓展外部投资来源，为国内经济增长寻求外部动力。在继续巩固来自欧美的投资之外，土耳其还积极寻求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中国的直接投资与资金援助。2018 年里拉危机爆发后，中东“盟友”卡塔尔紧急向土耳其投资了 150 亿美元。土耳其近来积极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并签署了多项经济合作协议，2021 年阿联酋领导人承诺投资 100 亿美元，2023 年沙特承诺向土耳其央行存入 50 亿美元，^④ 这对土耳其脆弱的里拉汇率与经济稳定发挥了一定支撑作用。

①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We Have Started a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y by Launching a Process of Growth Based on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December 31, 2021, <https://www.tcgb.gov.tr/en/news/542/134168/-we-have-started-a-historic-transformation-in-economy-by-launching-a-process-of-growth-based-on-production-and-exportation>, 2022-09-15.

②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Turkey’s Export Capacity Is Its Trump Card to Feature among the World’s Top 10 Economies”, September 18, 2021, <https://www.tcgb.gov.tr/en/news/542/130547/-turkey-s-export-capacity-is-its-trump-card-to-feature-among-the-world-s-top-10-economies>, 2022-09-15.

③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of Turkey, “The Exports Strategy of Turkey for 2023”, <https://www.trade.gov.tr/2023-export-strategy>, 2022-10-13.

④ “UAE Announces \$10 Billion Investment Fund in Turkey”, *Gulf News*, November 24, 2021, <https://gulfnews.com/uae/government/uae-announces-10-billion-investment-fund-in-turkey-1.83931419>; “Saudi Arabia to Deposit \$5 Billion in Turkey after Earthquake”, *Al-Monitor*, March 6, 2023,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3/03/saudi-arabia-deposit-5-billion-turkey-after-earthquake>, 2023-04-10.

第二，围绕“百年愿景”目标加强经济发展规划，土耳其政府持续推出经济改革调整措施。2011年之后，“百年愿景”成为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战略性指导文件，无论是国家发展“五年计划”还是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计划均以其为核心，并制定了详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① 依托“五年计划”和为期三年的“中期规划”，土耳其政府将“百年愿景”设定的经济目标分解为具体的中短期发展目标，并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2013年，土耳其发布了第十个“五年计划（2014—2018）”，其目标是到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至1.6万美元，出口达到2770亿美元，失业率降至7.2%；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创新经济，降低出口依赖等。^② 2019年，土耳其公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19—2023）”提出的目标更趋务实，计划到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8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至12484美元，出口达到2266亿美元，失业率下降至9.9%，通货膨胀率降至个位数。^③ 此外，2018年，土耳其还公布了三年经济规划（2019—2021），确定了三大经济政策支柱——坚持平衡发展、严格财政纪律与推动经济转型。2020年，土耳其公布了新一期三年经济规划（2021—2023），提出在此期间实现年均经济增速5%左右，重点关注出口、高附加值生产和就业等领域。2022年，土耳其公布的三年经济规划（2023—2025）则重申，将继续坚持低利率政策，优先考虑生产、增长和出口，争取稳定汇率、降低通胀、实现经常账户盈余，计划将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以上；通胀率和失业率降至10%以下。^④

此外，正发党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治理机构和经济监管模式的改革。2013年民众抗议、2015年大选争议、2016年未遂政变等一系列国内政治经济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和尝试进行经济改革，努力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2018年实现总统制改革之后，土耳其经济治理与监管模式发生重大变

① 魏敏、李炜懿：《土耳其〈2023年愿景〉：路径、成效和中土合作前景》，第95页。

② “Onunuc Kalkınma Planı (2014 - 2018)”, T. C. Cumhurbaşkanlığı Strateji ve Bütçe Başkanlığı, 2013 - 07 - 02, https://www.sbb.gov.tr/wp-content/uploads/2022/07/The_Tenth_Development_Plan_2014-2018.pdf, 2023 - 04 - 08.

③ “On Birinci Kalkınma Planı (2019 - 2023)”, T. C. Cumhurbaşkanlığı Strateji ve Bütçe Başkanlığı, 2019 - 07 - 18, https://www.sbb.gov.tr/wp-content/uploads/2022/07/Eleventh_Development_Plan_2019-2023.pdf, 2023 - 04 - 08.

④ 《土耳其发布三年经济规划促增长降通胀》，载《人民日报》2022年9月6日。

化，经济治理政治化影响加深，政府扩大了监管权限，将中央银行作为主要反周期工具，提升了对经济的参与力度。^① 这一时期，埃尔多安连续更换了 4 位央行行长和 3 位财政部长，改组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立了“公共财政转移办公室”和“金融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以推行围绕低利率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同时，土耳其政府加快了经济改革和调整的步伐，在“五年计划”和“中期规划”之外频频推出新的短期经济发展规划。例如，2018 年 8 月和 12 月，政府先后公布了总统制下的两个“百日行动计划”，确定优先和重点发展领域、项目及预算，推动形成新的投资激励模式，力图扭转不利局面。

第三，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土耳其政府推行经济增长优先的“新经济政策”。2018 年里拉危机之后，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以降低通胀率和财政赤字。此后，政府又多次将应对危机而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冠之以“新经济政策”或“新经济模式”。2018 年公布的三年经济规划正式名称就是“新经济计划”；2020 年公布的三年经济规划主题为“新稳定、新常态、新经济”。2021 年 3 月埃尔多安公布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改革两大部分，承诺开启一个“新经济时代”。^②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是“以降息抗通胀”，也被外界称为“埃尔多安经济学”。埃尔多安认为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即提高利率后银行无法通过借贷来维持强制准备金，并倾向于实行高利率放贷，这就使得为企业提供的贷款变得更加稀有和昂贵，由此会减缓经济增长。埃尔多安还认为，高利率会导致原本借贷较多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后将推升价格走高，进而加剧通胀情势。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通胀，土耳其应当采取低利率政策。在埃尔多安看来，采取传统的加息政策无法阻止因美联储加息所导致的资本外流，且会导致外汇储备大量流失，引发汇率大幅波动。而降息政策可以促进出口和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出口增加将带来企业收入上升，扩大国内就业，增加民众收入。同时，土耳其欲通过改革实现投资、就业、生产、出

^① Ümit Akçay,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Dynamics in Turke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7, No. 1, 2021, p. 81.

^② “President Erdogan Unveils Economic Reform Package”, *Hürriyet Daily News*, March 12, 2021,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president-erdogan-unveils-economic-reform-package-163084>, 2022-08-18.

口和经常账户盈余，以此为基础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并摆脱高利率—低汇率—高通胀的恶性循环。^①

作为土耳其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补充，埃尔多安力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是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后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改革措施。“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以降息促增长，但蕴含着引发里拉贬值和推升通胀的巨大风险，从现实来看也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面对2021年12月严重的里拉贬值和通胀飙升，土耳其政府继续加大对外向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促进出口增长，通过“里拉化战略”^②控制国内外汇资产流出，2022年仍继续实行降息政策；同时综合采取提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就业与食品补贴等多种方式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维持就业与社会稳定。

（二）“百年愿景”主要经济目标未能实现

“百年愿景”的宏大经济目标反映了土耳其对经济发展成就的高度重视和重大期许，愿景的提出客观上也推动了土耳其在经济领域的调整与改革进程。但是“百年愿景”经济目标提出后，土耳其经济自2012年起陷入低速增长和震荡状态，波动性和脆弱性特征日益突出。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更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数次发生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经济稳定。在此期间，土耳其根据本国经济结构特点将重心放在通过投资、出口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成效来看，土耳其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新经济政策”在促进出口增长、维持就业规模、保持经济稳定和应对经济危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避免了危机蔓延和经济崩溃，这也反映出土耳其经济的多元化产业基础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然而，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现实表现来衡量，土耳其在2023年到来之际未能实现“百年愿景”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第一，土耳其经济增长表现出波动性和失衡性特征，未实现成为全球十大经济体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万美元的愿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以可比价格测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12~2021年间土耳其有6

^①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Our Country Determinedly Marches towards Its Goal of the Great and Powerful Türkiye”, August 22, 2022, <https://www.tcgb.gov.tr/en/news/542/139210/-our-country-determinedly-marches-towards-its-goal-of-the-great-and-powerful-turkiye>, 2022-12-09.

^② “里拉化战略”是通过政策强制和激励诱导，推动私人银行和实体部门间接向央行出售外汇，然后将现金投资于受外汇保护的里拉存款账户，这样既增加了央行外汇储备，也有助于政府的里拉存款保障计划的可持续性，从而稳定里拉汇率，增加政策缓冲，防范可能的外汇市场冲击。

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 5%，而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带来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显著缩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3 年达到 9 575 亿美元的峰值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直到 2021 年才有所回升，但 2022 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是回升至 8 535 亿美元。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2 490 美元的高点一路下滑至 2020 年的 8 610 美元，2022 年才回升至 9 960 美元。^① 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是“百年愿景”设定的标志性目标，然而土耳其的全球经济总量排名从高峰时期的全球第 17 位滑落至第 19 位。^② 这与“百年愿景”设定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和全球经济排名目标相距甚远，且短期内难以实现该目标。

第二，土耳其对外贸易额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并长期处于高水平赤字状态，出口虽然大幅扩张但并未实现设定目标。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TÜİK）数据，2012 年至 2020 年，土耳其对外贸易总额基本维持在 4 000 亿美元左右，年平均出口额约为 1 470 亿美元；而年平均贸易赤字达到 637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长期保持在 5% ~ 10%，只有 2019 年因进口萎缩贸易赤字降至 5% 以下。^③ 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给土耳其的外汇流入和资本市场稳定带来重大挑战。2021 年和 2022 年，土耳其对外贸易出现大幅增长，出口额分别增长至 2 252 亿美元和 2 541 亿美元，进口额分别达到 2 714 亿美元和 3 637 亿美元；而贸易赤字也屡创新高，特别是 2022 年贸易赤字高达 1 096 亿美元，上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8%。^④ 即使如此，这与“百年愿景”设定的出口额达到 5 000 亿美元的目标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就业与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土耳其经济长期深受货币贬值困扰，里拉成为全球表现最差和最易于受到冲击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从 2013 年开始，土耳其里拉就呈现持续贬值的态势，2018 年以来更多次出现剧烈贬值，一再跌破历史纪录，造成国内金融市场动荡。根据土耳其中央银行（TCMB）数据，里拉兑美元汇率从

① IMF, “Country Data: Turke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TUR>, 2023-04-25.

② “The World Bank in Turkey”, April 10,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rkey/overview>, 2023-04-25.

③ TURKSTAT (TÜİK), “Foreign Trade Statistic”, <https://data.tuik.gov.tr/Kategori/GetKategori?p=Foreign-Trade-104>, 2023-04-16.

④ TURKSTAT (TÜİK), “Foreign Trade by Year, 2013-2021”, <https://data.tuik.gov.tr/Kategori/GetKategori?p=dis-ticaret-104&dil=2>, 2023-04-12.

2013 年年初的 1.77:1 一路贬值至 2022 年 12 月初的 18.6:1。2018 年 8 月、2020 年 10 月和 2021 年 12 月，土耳其金融市场几度出现严重震荡。在 2021 年末的货币危机中，里拉兑美元汇率从 13.3:1 快速跌破 18:1 大关。因政府紧急出台储蓄担保补偿方案，里拉反弹并保持了短期稳定，但 2022 年中期之后重新出现持续贬值趋势，8 月以后再次跌破 18:1 大关。^① 虽然外界一直质疑土耳其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多次建议加息，但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改变其既定政策。2022 年 8 月至 11 月，土耳其央行连续 4 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 9% 的低位，^② 随之里拉汇率再次进入快速贬值通道。

另一方面，土耳其一直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和就业压力，政府设定的通胀率和失业率目标从未实现。2017 年之前土耳其的通胀率控制在 10% 以下，2018 年因里拉危机而飙升至 20.3%，之后两年降至 15% 以下。2021 年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出现新一轮上涨，并在当年 12 月严重的里拉危机之后开始快速攀升。2022 年之后通胀率更是一路飙升，从当年 1 月的 48.69% 升至 10 月的 85.51%，创下 24 年来的最高纪录，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③ 通货膨胀叠加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后的能源危机，加剧了土耳其国内民生困难，面包等食品、生活用品及房屋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民众购买力受到严重削弱；能源进口和交通运输成本飙升造成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失业率也处于高位。土耳其官方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10% 左右，并未有显著下降，其中 2019 年和 2020 年还上升至 13% 以上，^④ “百年愿景”设定的降低通胀率和失业率的目标亦未能实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百年愿景”提出后的近十余年来，土耳其经济未能重现正发党执政前期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也未能实现预期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这从土耳其政府和国际经济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验证。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力推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能够基本稳住经济形势，短期内推动

① 参见土耳其中央银行 (TCMB) 网站: <https://www.tcmb.gov.tr>, 2023-02-25。

② TCMB, “Press Release on Interest Rates (2022-47)”, November 24, 2022, <https://www.tcmb.gov.tr/wps/wcm/connect/EN/TCMB+EN/Main+Menu/Announcements/Press+Releases/2022/ANO2022-47>, 2023-04-12。

③ TURKSTAT (TÜİK), “Consumer Price Index”, March 3, 2022, <https://data.tuik.gov.tr/Bulten/Index?p=Consumer-Price-Index-February-2022-45791&dil=2>, 2023-02-23。

④ 参见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data.tuik.gov.tr/Kategori/GetKategori?p=istihdam-issizlik-ve-ucret-108&dil=2>, 2023-04-18。

了出口和经济增长，但很难具有可持续性。当然，将土耳其的经济问题完全归因于“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失误和失败并不符合客观事实，更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土耳其经济之所以陷入当下困境，不仅受到内外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更与土耳其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结合历史经验与短期成效来看，埃尔多安力推的“新经济政策”有一定合理性。鉴于本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以加息应对美元紧缩周期仍难逃被国际资本收割的事实，土耳其放弃以加息保里拉汇率、阻止资本外流的传统做法，转而采取降息以促进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路线，短期内不失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降息政策和里拉贬值的确拉动了土耳其的出口增长，这从2021年和2022年的出口数据中得到明确体现。面对严重货币贬值和通胀危机，土耳其政府的经济举措也一度扭转了里拉下跌态势，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危机蔓延甚至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此外，在“百年愿景”经济目标指引下，土耳其在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间歇性的经济逆势增长也体现出土耳其内在韧性与相关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

三 影响“百年愿景”经济目标实现的多重因素

2011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同时面临着国家社会发展、国内政治变动和国际局势剧变三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①虽然“百年愿景”在带动土耳其经济调整改革、推动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稳定经济局面等方面产生了多重积极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经济已很难复制之前的快速增长模式。经济失速、政局动荡和外部冲击相互交织，加之土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不断累积和凸显，致使“百年愿景”所设定的主要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一）经济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增长与治理困境

土耳其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累积了诸多结构性弊端，包括产业体系不健全且升级困难、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外部资金流入、经济失衡与脆弱性突出

^①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72页。

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正发党执政前十年，土耳其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实现经济外向转型和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开放，外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与外部市场关联密切的出口部门持续扩大。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实质性升级和内生发展动力的增强，而前期改革红利逐步消耗殆尽。土耳其的产业结构仍长期在中低端徘徊，技术和产业升级缓慢，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加之能源严重依赖进口，造成长期经常项目赤字，加深了其对资本项目顺差的依赖，并逐步推升了国内公私部门的外债水平。土耳其资本市场高度开放，使得本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与全球宏观经济表现及国际资本流动深度绑定，更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随着改革放缓和生产率下降，土耳其经济越来越依赖外部信贷和需求，这一增长模式加剧了内外失衡和脆弱性。^①这构成了土耳其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催生了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高外债、高赤字、高通胀”叠加的多重治理困境。

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严重影响到土耳其经济增长的稳定。一方面，高水平的经常账户赤字与不断走高的外债规模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2012年以来，土耳其的政府债务经历了先降后升的“U”形走势，2021年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1.8%，国家总外债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8.4%。^②其中，短期外债总额已超过其外汇储备额。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土耳其的短期外债为1614亿美元，其中私营部门短期外债为903亿美元；46%为美元计价外债，25%为欧元计价外债，二者合计占到71%。^③而同期土耳其的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为1149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只有609亿美元。^④如果剔除与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国央行的外汇互换，净储备将降至负数。外债攀升和外汇储备的短缺加深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使土耳其经济难以有效抵御任何

^① IMF Country Report, No. 21/110, June 11,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21/06/11/Turkey-2021-Article-IV-Consultation-Press-Release-Staff-Report-and-Statement-by-the-50205>, 2022-12-21.

^② IMF, “Country Data: Turkey”,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TUR>, 2023-03-26.

^③ TCMB, “Short Term External Debt Statistics”, <https://www.tcmb.gov.tr/wps/wcm/connect/EN/TCMB+EN/Main+Menu/Statistics/Balance+of+Payments+and+Related+Statistics/Short+Term+External+Debt+Statisticss>, 2023-04-16.

^④ TCMB,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Foreign Currency Liquidity”, <https://www.tcmb.gov.tr/wps/wcm/connect/EN/TCMB+EN/Main+Menu/Statistics/Balance+of+Payments+and+Related+Statistics/International+Reserves+and+Foreign+Currency+Liquidity>, 2023-04-16.

严重的外部冲击。^①此外,由于土耳其经济高度依赖外资流入,债务负担过高将带来严重问题,资金流向与结构不合理将放大其负面效应。^②另一方面,经济脆弱性使土耳其经济增长极易受外部冲击而剧烈波动。2018年,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和里拉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从去年的7.5%骤降至3%,2019年进一步降至0.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快速货币与信贷扩张以及大量的流动性支持推动土耳其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021年甚至实现了少有的超过10%的高增长,但这种增长并非源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注定难以持续。^③虽然埃尔多安数十次表示将实现“百年愿景”发展目标,土耳其要走上投资、生产和出口、就业增长为基础的发展之路,但具体方案与路径始终不甚清晰。

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加剧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治理困境。面对经济结构性危机凸显催生出的“三高”局面,土耳其政府力推“新经济政策”,希望通过降息利好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导致短期通胀加剧、汇率波动和民生困难,且产生了相互掣肘甚至冲突的政策困境。由于土耳其对能源、中间产品、原材料等进口依赖度很高,货币贬值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高了国内终端产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生产活动各环节物价相互传导,最终削弱了严重依赖能源和中间产品进口的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为应对不利的资本流动和日益增加的金融脆弱性,里拉危机后土耳其央行将金融稳定作为优先任务,而失去了对通胀的有效控制。^④面对通胀,国内民众更愿意持有美元或欧元,较高的美元化率代表着较低的消费者信心,不仅加剧了里拉贬值的趋势,也增加了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难度。^⑤实际上,货币政策对经济

① World Bank, “Turkey Economic Monitor: Navigating the Waves”, April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rkey/publication/economic-monitor>, 2022-12-22.

② Yılmaz Toktaş, Ali Altiner & Eda Bozku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rkey’s Foreign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Asymmetric Causality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Vol. 51, No. 26, 2019, pp. 2807-2815.

③ IMF Country Report, No. 21/110, June 11, 2021.

④ Metin Özdemir,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Inflation Targeting: The Case of Turkey”, *Applied Economics*, Vol. 52, No. 29, 2020, p. 3149.

⑤ Layal Mansour - Ichrakieh and Hussein Zeaiter, “The Role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the Turkish Economy Opportunity or Threat”,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0, Issue C, 2019, doi: 10.1016/j.najef.2019.101000; Layal Mansour - Ishrakieh, Leila Dagher, and Sadika El Hariri, “Not the Usual Suspects: Critical Indicators in a Dollarized Country’s Financial Stress Index”,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Vol. 32, Issue C, 2020, doi: 10.1016/j.frl.2019.03.037, 2022-12-15.

增长的促进具有局限性，由于土耳其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供应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性影响，货币政策应将物价稳定作为优先目标。^① 里拉贬值还带来外债风险上升，土耳其主权债务信用面临更大降级威胁，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冲击，增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曾多次下调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② 世界银行建议土耳其对其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提振市场信心，缓解宏观金融风险，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继续扩大内外失衡。^③ 总之，土耳其政府无法同时兼顾汇率、通胀和就业稳定等多重经济目标，更难以解决长期累积的经济结构性危机，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就难以实现。

（二）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与经济政策工具化

一方面，国内政治变革与政治极化带来日益明显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百年愿景”提出后，土耳其相继经历了 2013 年加齐公园抗议、正发党与“居伦运动”的政治联盟解体、2015 年惊险波折的议会选举和 2016 年未遂政变等重大政治事件。国内政治体制发生了从 2014 年总统直选到 2017 年修宪公投、2018 年正式改行总统制的巨大变革，实行近百年的议会制政体改为总统制。伴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体系性变化，埃尔多安的集权统治色彩更加明显。总统制下土耳其的经济决策表现出集中化、个性化和政治化的特征，缺乏有效制衡。^④ 大权独揽的埃尔多安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部门的控制和经济政策的直接干预，经济决策掺杂了更多的政治考量，降低了决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此外，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政商关系和裙带主义广受诟病。有学者认为，经济领域的新世袭主义与选举威权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共同构成“埃尔多安主义”的四大维度。^⑤ 甚至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经济

① Ilker Domac, Gultekin Isiklar & Magda Kandil, “On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in Turkey”,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11, No. 2, 2019, p. 220.

② “Turkey – Credit Rating”,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rating>, 2022 – 12 – 21.

③ World Bank, “Turkey Economic Monitor: Sailing Against the Tide”, February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turkey/publication/economic-monitor>, 2022 – 10 – 18.

④ Pinar Bedirhanoglu,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Turkey: Beyond the Depoliticization versus Repoliticisation Dichotom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2022, p. 109.

⑤ Ihsan Yilmaz & Galib Bashirov, “The AKP after 15 Years: Emergence of Erdoganism in Turke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9, No. 9, 2018, p. 1812.

危机是土耳其脆弱的总统制及其独特经济治理模式的反映。^①与此同时，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明显，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两大阵营对立严重，国内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孰优孰劣及埃尔多安威权主义的争议愈演愈烈，经济问题的凸显也使之成为国内政党斗争的重要议题。

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纷争下的经济政策工具化影响到长期经济改革与转型进程。“百年愿景”明确提出要坚持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后来土耳其政府也提出了诸多经济发展规划，包括近年力推的“新经济政策”都将目标定位于实现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面对经济问题和政治争议叠加的危机局面，土耳其政府更难以集中精力解决结构性问题，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和经济结构性改革让位于优先维持统治地位的短期性、工具化经济政策，国内政治压力更加剧了这一倾向。在此背景下，容易带来可见经济与政治效益的出口部门被赋予了更为优先的地位，产业升级和投资不足的难题始终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2023 年大选之前，经济问题成为国内激辩的重要议题，对于埃尔多安主导的土耳其政府来说，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内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要为赢得总统大选连任的优先目标服务。土耳其政府近年所实行的一系列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本来就不是保持长期的经济稳定，而只是要在 2023 年大选之前促进经济活力。^②为应对高通胀和获取民众支持，土耳其政府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食品与住房补贴支持，取消退休年龄限制，让更多的人可以领取养老金，迎合了国内民粹主义上升情势。但持续推出的补贴措施仍赶不上通货膨胀速度，并增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经济隐患。此外，着眼于短期增长的信贷扩张还可能加剧宏观金融风险的积累，对中长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限制了未来经济改革的政策空间。^③总之，以服务政治统治和获得选民支持为目的的短期性经济政策加重了经济结构性困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为未来长期性改革增添了更大障碍。

^① Ziya Öniş & Mustafa Kutlay, “The Anatomy of Turkey’s New Heterodox Crisis: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Global Dynamics”, *Turkish Studies*, Vol. 22, No. 4, 2021, pp. 499 – 523.

^② M. Murat Kubilay, “As Liquidity Problems Worsen, Turkey Turns to Capital Controls and Informal FX Flows”,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7,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liquidity-problems-worsen-turkey-turns-capital-controls-and-informal-fx-flows>, 2023-02-18.

^③ Hande Küçük, Pınar Özlü & Çağlar Yüncüler, “Decomposition of Bank Loans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urkey”, *Applied Economics*, Vol. 54, No. 3, 2022, p. 263.

（三）国际环境不利变化带来的持续冲击

有研究发现，土耳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内政治因素和外部市场冲击有关，如国内大选、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①其中，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对外关系。但自“百年愿景”提出以来，之前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周边地缘政治动荡、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不利因素相继对土耳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增大了输入性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也加剧了经济脆弱性风险，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预期与实际表现。

首先，高度外向型的土耳其经济深受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的影响。金融自由化改革导致资本流入的激增，加剧了土耳其债务主导、金融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加深了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②持续性的经常账户赤字、国内低储蓄率和高美元化负债使土耳其经济呈现出高度脆弱和波动起伏的特征。土耳其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的60%以上来自欧盟，欧盟对其汽车业、纺织业、建筑业、旅游业等支柱产业具有系统性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土耳其的经济表现，而美欧货币政策调整对其金融市场影响更为显著。在遭遇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或重大地缘政治与外交危机的情况下，土耳其经济更易于陷入困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流入土耳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且多是短期资本。^③随着2013年之后美元紧缩周期的开始，土耳其经济陷入了低速增长状态，里拉呈现持续贬值趋势。2021年以来美联储新一轮紧缩政策再次增大了土耳其的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以及高水平美元计价外债的还款压力，土耳其外汇流动性日益缺乏，限制了其经济增长空间。

其次，与美欧关系的波动对土耳其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冲击。毫无疑问，近年来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其和西方关系的逐渐疏远密切相关。^④近

^① Saygin Sahinoz & Evren Erdogan Cosar,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urkey”,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Vol. 25, No. 21, 2018, p. 1518.

^② Ayca Zayim, “Financialized Growth and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Finance: Turkey’s Debt – Led Growth Regime and Policy Response after the Crisis”, *Politics & Society*, Vol. 50, No. 4, 2022, p. 543.

^③ Yahya M. Madra & Sedat Yilmaz, “Turkey’s Decline into (Civil) War Economy: From Neoliberal Populism to Corporate Nationalis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January 2019, p. 44.

^④ Nikolaos A. Kyriazis & Emmanouil – M. L. Economou, “The Impacts of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on Turkish Lira during the Erdogan Administration”,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33, No. 6, 2022, p. 731.

年来，土耳其与美欧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互信持续下降。“居伦运动”、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等争议困扰着土美关系。总体上，土美关系疏离的趋势和本质没有改变。^① 而土耳其与欧盟在入盟、民主、人权、难民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在东地中海、利比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相互对立，土欧关系经常陷入紧张状态。在此背景下，美欧多次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压制和重塑土耳其的内外政策。土耳其入盟进程陷入停滞，来自欧盟的投资与拨款受到直接影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 年更是以霸凌式经济制裁对土耳其进行直接施压，成为引爆土耳其里拉危机和经济震荡的导火索。美欧的经济打压虽未能改变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政策，但对其经济与金融稳定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最后，土耳其经济受到周边地缘环境恶化的显著影响。阿拉伯剧变爆发以来，土耳其周边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叙利亚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崛起和地缘政治对抗对土耳其经济造成了持续冲击。土耳其改变了“零问题”外交政策，以“新奥斯曼主义”思潮和“回归中东”政策重塑与周边国家关系，强势介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东地中海油气纷争^②等地区热点问题，与埃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国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激进的外交政策倾向加剧了土耳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经济脆弱性。阿拉伯剧变的地缘政治影响深远，土耳其国内经济频繁遭受冲击。^③ 此外，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经济下行和旅游业萧条，打乱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而 2022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也对土耳其经济造成直接冲击和重大影响。土耳其与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经济联系均较为密切，来自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以及俄、乌两国的农产品、游客等对于土耳其经济来说尤为重要，乌克兰危机恰逢土耳其经济陷入危机之时，无疑加剧了其经济困境。^④ 进入 2023 年，乌克兰危机、美国的加息进程都尚未结束，这均为土

① 宫小飞、石斌：《叙利亚危机与美土关系的疏离》，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94 页。

② 参见王晋：《能源撬动政治：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第 21～41 页。

③ 魏敏：《中东剧变与土耳其的政治和外交转型》，载《中东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④ M. Murat Kubilay, “The Ukraine War Has Upended Turkey’s Plans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Middle East Institute, March 23, 2022, <https://mei.edu/publications/ukraine-war-has-upended-turkeys-plans-stabilize-economy>, 2022-10-18.

土耳其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总之，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制约、顾此失彼的政策困境、国内政治纷争和不利国际环境的冲击都阻碍了土耳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削弱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效果，共同导致“百年愿景”所设定的主要经济目标无法如期实现。

四 结语

“百年愿景”是土耳其长期追求的强国梦和理想治理图景的集中体现，其宏大经济目标延续和引领着土耳其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然而，正如过去百年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曲折历史一样，当前土耳其对理想之治的追求同样不会一帆风顺。回首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经济发展表现，“百年愿景”提出的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近十余年来的土耳其经济动荡现实与之前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相比呈现出明显差异。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困境使土耳其的“百年愿景”和“新土耳其”描绘的强国梦想受挫，使正发党与埃尔多安20年来引以为傲的政绩黯然失色，也使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国家治理模式备受争议。外界甚至认为土耳其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危机和政治疲惫为标志的“土耳其历史上的晦暗时期”^①。在土耳其迎来建国百年纪念的特殊时刻，尽管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2023年5月大选中再次赢得了议会和总统选举胜利，但经济治理困境仍是摆在土耳其政府面前的关键挑战。经济问题的持续积累不仅加大了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其所带来的政治传导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正发党与土耳其政府的内外政策选择及其限度。

2023年大选结果表明，经济问题并不是影响国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议题，外界对土耳其政治与经济走向的误解与误判同样严重。然而，经济问题无疑是土耳其政府面临的最真实和紧迫的挑战之一，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土耳其国内政治极化加剧与经济困境的持续，国内各方对于政治制度与国家发展道路的争议并不会随着大选的尘埃落定而逐渐消失。虽然近年来埃尔多安反复强调土耳其必将实现发展目标，并

^① Bülent Gökay, *Turkey in the Global Economy: Neoliberalism, Global Shift and the Making of a Rising Power*, Newcastle upon Tyne: Agenda Publishing, 2021, p. 166.

以提出和建设“土耳其世纪”倡议来迎接建国百年的到来，但是“百年愿景”所设定的经济目标显然未能如期实现，土耳其政府仍面临严峻而紧迫的通胀、就业等民生挑战。从长远来看，反思土耳其经济发展历史中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真正提升土耳其的产业竞争力和重塑经济发展动力，应是埃尔多安在新一任期所要推动的核心议程之一。此次大选后，新组建的土耳其政府表现出调整经济政策的倾向，但鉴于过去多年经济政策的惯性和现实困境，新的政策调整仍将是一个艰难和缓慢的过程。面对尽快降低通胀、完成地震后重建、保持金融稳定等短期紧迫任务，土耳其政府依然很难做到集中精力推进前景不明的结构性经济改革，长期改革前景仍旧暗淡，而且仍面临复杂外部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百年愿景”在经济领域所遭遇的困难也将投射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上。2002 年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显著转变，从提倡相互依存到主张战略自主。^①近年来，土耳其的多元平衡外交有声有色，在从各方获得现实利益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和议价能力。然而，土耳其经济深受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政策调整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不仅限制了其经济政策的选择余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外交政策与战略自主的限度。在与美欧关系层面，虽然近年来土耳其在政治、外交甚至安全领域对西方态度日趋强硬，但经济依赖却成为其与西方关系中的关键软肋之一，使土耳其外交上的独立政策诉求受到显著制约。在地区国际关系层面，为了寻求外部资金缓解国内经济困境，土耳其与周边国家陆续缓和关系以争取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和经济援助。这些都深刻说明了土耳其经济脆弱性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整体实力不足是制约土耳其战略自主和外交政策选择的根本因素，经济上的外向型高度依赖更束缚了其手脚。展望未来，“百年愿景”所设定的全球十大经济体和“新土耳其”所期待的全球中心大国目标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土耳其对理想之治的追求仍将面临持续的现实之困。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Mustafa Kutlay and Ziya Öniş,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 – Western Order: Strategic Autonomy or New Forms of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 1085.